

第 1 章

戴震生活的时代

一、 引 言

——从戴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谈起

戴震（1724—1777），是 18 世纪中国的一位具有十分奇特的个性的大思想家。

这位大思想家与那些有资格与孔子共享祭祀、被请到孔庙的两庑中去陪伴孔子吃冷猪肉的大思想家们全然不同——他的思想性格与历代专制帝王的要求、与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氛围，是那样地格格不入；他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也与今天的社会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君主专制、程朱理学独尊的时代早已在中国成为过去。——但是倘若以 200 年前的传统社会的眼光、专制统治者的眼光看戴震，他简直就是传统文化的叛逆！不信请看：

——满清王朝以程朱理学为孔子之真传，以程朱的“天理”来

统驭宰制天下。雍正、乾隆皇帝每当要杀人时，总要大讲“天理”，标榜杀得有“理”，即使采用“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的凌迟碎剐之刑来杀敢于议论朝政的读书人、再将“该犯”的妻女送到军营中去给大兵轮奸（在清朝叫“给披甲人为奴”），也是“天理当然”！为什么如此残忍呢？其根据就在于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谁违背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天理”以及由此派生出一整套宗法礼教，就是严重的道德问题；而在政治与伦理合一的传统社会中，道德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对于违反了封建道德的人，无论如何残忍都被看作是“天经地义”，轻则“小子鸣鼓而攻之”，重则“投畀豺虎”。可是，生在 18 世纪的戴震，则要“发狂打破（神化‘天理’的）宋儒家中《太极图》”，不仅怒斥宋儒“以理杀人”，而且痛斥“今人”（满清统治者）以理杀人，谴责天下的权势者们挟其势位以所谓“天理”来威慑人、践踏人、侮辱人、把人不当人的惨酷现实

——满清王朝凭借程朱理学来推行其蒙昧主义，要普天下人以皇帝的思想为思想，以程朱之是非为是非，谁敢立异，就是“肆诋程朱”、“是为人心学术之害”（乾隆皇帝语），非严惩不可。而戴震，却要人们意识到脑袋是在自己肩上长着的，要独立思考，独立地去探求真理；为了获得真理，就要“去人蔽”，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还要“去己蔽”，不要因利欲熏心而把谬误当真理；他认为真理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人们很容易把“意见”当真理，因此，与其对认识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毋宁持一种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的态度；真理不是宋儒标榜的无所不在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天理”，而是门类各别的具体事物的条理、文理、分理、腠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真理的获得不能凭神秘的直觉……

——满清王朝以程朱理学来控制人民的感性生活，大张旗鼓地推行以“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为主要宗旨的道德礼教下移运动，满天飞的是朝廷的道德劝谕，遍地立的是烈女的贞操牌坊。“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夜新鬼哭还魂。”这是 18 世纪中国宗法农村社会氛围的真实写照。迎合这种社会氛围的学者，就会获得社会对其“道德文章”的褒奖，赠以“既做学问又做人”的美名——尽管这“人”是昧着良心地“做”出来的——然而，戴震却不怕人骂他“不道德”和“心术未醇”，公然谴责满清政府的道德礼教下移运动，揭露宋儒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抨击那些要求人民“灭人欲”的统治者吃腻了生猛海鲜吃珍禽、玩够了女人玩男伎的“邪”与“私”，肯定人民大众的“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的“正”与“公”……

他在发表以上言论后没过多少天就因患“足疾”、在吃了“医生”给他开的一两黑山栀后就死掉了，年仅 55 岁。220 年来，至今没有人怀疑他的死因。暗害异端思想家的事，外国是有的（如 1923 年保加利亚国王决定派人暗杀一批大学教授），但这种事在礼义文明之邦的大清帝国决不会有，尤其是坐在“正大光明殿”上的明君圣主乾隆皇帝是不会派人去暗害戴震的。只有戴震的学生段玉裁的外孙龚自珍竟敢说自古帝王没有不搞阴谋诡计的，但他在讲了这番话离开北京后，还没到家，就在江苏丹阳“暴死”了，年仅 49 岁。据说这些人短命都是“天诛”，因为他们与皇帝、权势者和土豪劣绅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中国文化”作对，“天理难容”嘛！此后，只有晚年鲁迅在仔细考察了中国历史、特别是看到了明朝永乐皇帝下令将被杀读书人的妻女送去给大兵轮奸、又令将被轮奸至死的女子“拖出去着狗子吃了”的史料以后，极

痛苦地说中国传统社会暗无天日：“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戴震的学说岂止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还有的研究者说戴震的思想学说简直不像中国文化。戴震全面批判程朱理学，建立了一个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伦理学的严整的思想体系。他所使用的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是西方近代启蒙学者笛卡尔、斯宾诺莎所使用的几何学的公理演绎方法。近代学者惊叹，像这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其思想也不像中国思想，甚至还有人說戴震的学说“纯属西洋思想”。直到 1994 年，还有一位学者在仔细考证戴震是否“搭纂修四库全书的便车”抄袭了西方人的著作，例如明朝末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所著的《天主实义》。

但我以为，戴震的思想虽然与专制统治者尊奉的正统的“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但戴震的思想恰恰又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发展之所孕育，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之所造就。这样说岂不自相矛盾？不然。

第一，中国文化本不限于封建正统文化，尤非程朱理学所能代表；在封建正统文化之外，还有或多或少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精华的各种亚文化。中国的读书人中，不仅有既歌颂升平、又粉饰黑暗的人，也有敢于揭露黑暗、为民请命的人。

第二，即使是封建正统文化，也不能因为专制统治者“吃人”，就说“仁义礼智信”这几个道德范畴要不得；不能因为专制

统治者搞阴谋诡计，就说“正大光明”这几个字也不是好字眼；不能因为专制统治者以其阶级的私利冒充“天下之大公”，就说“公”也要不得。专制统治者要维护其统治，就必须欺骗人民；而要欺骗人民，就总得说出一些多少反映人民美好愿望的甜言蜜语，这就说明封建正统文化中也不全是糟粕，抽象的道德范畴可以被后人赋予新解而沿用。

第三，更要看到，中国文化又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旧文化可以通过变革、发展而形成和产生出新的文化。——与戴震同时的大诗人赵翼说得好：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满清统治的沉沉阴霾和“文字狱”的刀光血影中，敏感的诗人却依稀感受到了在中国大地上孕育着的“新”与“变”的气息，隐约听到了新的时代行将来临的地下轰鸣。文学界是如此，思想界也是如此。

戴震的思想既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特别是他所处的中国传统社会酝酿着“新”与“变”、开始了其转型的时代的产物，所以也就必然会反转来给予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然而，以往有一种观点却认为，戴震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小。这一观点由梁启超、胡适等人发其端，侯外庐等人衍其绪，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得到广为认同的观点。

梁启超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虽然，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此书盖百余年来未生反响之书也。……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

动’，非‘主义的运动’也。”^①

胡适说，“清朝的二百七十年中，只有学问，而没有哲学；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其间只有颜李和戴震可算是有建设新哲学的野心”，但颜李学派几乎沉埋不显，“戴震的门下，传经学的有人，传音韵学的有人，传古制度学的有人；只是传他的哲学的，竟没有人。”^②

侯外庐说：“自炳麟（章太炎，——引者）开始，戴学在哲学方面才被人注意。”又说：“乾嘉时代的戴震哲学在当时除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没有起着社会影响，因而历史的价值也是有限的。”^③

萧蓬父先生和我在著于 1992—1993 年间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开始提出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看法，肯定戴震“从考据中开出义理”的思想影响比以往的诸位大师所说的要大得多。但如今看来，对戴震思想的影响和传承关系仍缺乏小心求证，同时还忽视了几位受戴震思想影响的重要人物。这一不足，当在本书中予以弥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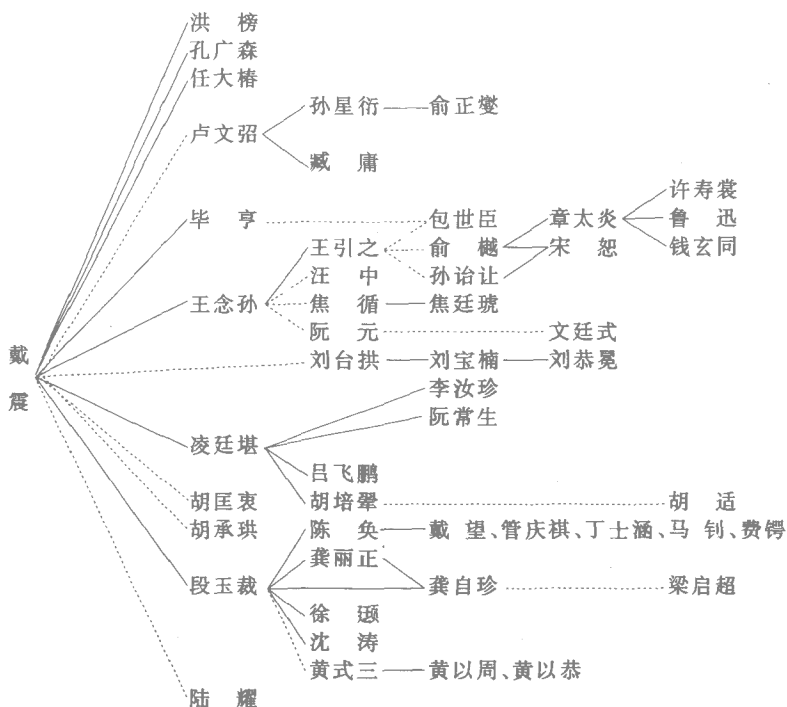
虽然不是哲学家但似可看作思想家的受戴震影响的学者，有年纪小于戴震的钱大昕、纪昀等人；此外，有虽然从人品上攻击戴震、但却颇得戴学神韵的著名历史哲学家章学诚。从戴震思想的传承及由此产生的影响看，亦可从下表中所涉及的人物的著述中发掘出很多宣传和发展戴震思想的资料，——当然，必须打破传统的经今古文学的壁垒，亦不可将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区分看得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近代中国学术论丛》第 75 页。香港：崇文书店 1973 年 3 月版。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第 1038—1039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91 年 12 月版。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第 5 卷）第 459、46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8 月版。

过分严格，——试根据清代史料列表如下：



图中实线表示有确定的师生关系者（包括“自附于私淑之末”者），虚线表示亦师亦友者或崇拜者。从以上这一尚且很不完备的戴学的传承系统图可见，戴学（包括其思想）一直没有中断其传承，它从清代中叶传承到近代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宋恕和梁启超，传承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一直传承到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和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思想家胡适，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矣！

因此，考察戴震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考察

戴震生活的时代。不仅考察他生活的 18 世纪中的 55 年时光，而且要考察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这一历史上的大时代。只有这样，才能既证明大思想家戴震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产儿，是中国文化的民主性精华和人民性精华之所荟萃；同时，也只有通过对这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大时代的考察，才能说明戴震思想对于 18—19 世纪的一大批中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影响，才能说明戴震思想为什么能一直影响到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等一批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并通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转型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最后，也才能说明：大思想家戴震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光荣和骄傲，中华民族有理由为产生了像戴震这样的富于人民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大思想家而感到自豪！

二、中国经济的内发原生的早期 现代化萌动

西方中心论者是不承认中国社会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化萌动的。他们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这一古老国度的现代化只有靠来自外力的影响和推动。我们国内的某些学者，囿于对历史表象的考察——仿佛现代化是在自西而东地作环球旅行，自英法经德俄至中国——于是便有“西方的现代化是内发原生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发次生型”的说法。更有一种貌似深刻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系统论”，作为上述说法的立论基石而被许多人默许或肯认。

笼统的表象之论不能取代对历史实际的考察和对历史真相的揭示。所谓历史的“实际”，也就是从戴震到胡适所说的：拿证据来！所谓历史的“实际”，就是依据历史所提供的事实而揭示那往

往为弥漫着的表象所遮蔽的深藏在物质经济的事实中的内在规律。把二者综合起来说，就是一句极其简明的格言：实事求是！

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从 15—16 世纪起，人类社会开始从国别的、区域的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在西方和东方文明内部都先后生长出现代经济和思想文化等“世界历史”的因素，并按照体现着这一总趋向的各自的特殊发展道路而走向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在中国，从明代嘉靖初至清道光二十年——即 16 世纪 30 年代至 19 世纪 30 年代——正是一个使古老文明汇入世界历史的特殊发展时期，是中国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自己的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的时期。尽管中国社会的新的经济因素和思想文化在中国社会特定的背景下和以清代明的历史洪流中的发展屡屡受挫而曲折跌宕，但终究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终于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在与西方列强的血与火的冲突中将自身的现代化要求与世界潮流相接轨。而产生于 18 世纪的大思想家戴震的学说，正是中国社会内发原生的现代化萌动的观念形态表现。

中国经济内发原生的现代化萌动约分三期。

第一期：从明代嘉靖至崇祯，约 16 世纪 30 年代至 17 世纪 40 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其特点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这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论》中的两句话，说的是晚明社会靠商业致富的人多了起来，靠旧式农业致富的人却日益减少。——歙县是戴震的家乡，是靠商业致富的典型地区之一。与此同时，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延颈待雇”，形成了自由的劳务市场和“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关系，这种情形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最为发达。戴震家乡徽州的商人和东南沿海的人民还开始向海外发展，并且在与西方殖民者争夺西太平洋贸易制海权的斗争中

占有了明显的优势。^①

然而，近十余年以来在中国最为风行的 19 世纪末德国大社会学家 M·韦伯的理论，却列举出了中国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的若干理由：一是商业资本重新流向土地；二是不存在纯粹商业性的市镇；三是以农为本的传统国策阻碍商业经济发展。这三条理由都不合乎晚明社会的实际。在晚明，商业资本不再流向土地，而是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弃儒从商的士人和弃农经商的地主大量出现；不带有政治和军事性质的纯粹商业性市镇纷纷兴起，早期市民阶层也开始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斗争，东林党人和许多无党派人士呼唤“工商皆本”，充当市民阶层利益的代言人。就连一向实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的明王朝中央政府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也开始在经济领域中实行有限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包括：终结土地国有制的“官民一则起科”政策，变实物赋税为货币赋税的“一条鞭法”，变劳役为“以银代差”的匠籍制度改革，允许民间开矿及数次开放海禁等等。M·韦伯作为一个德国的大社会学家，虽然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虽然中国哲学界、史学界许多人对他奉若神明，但实在说来，他并没有对 16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任何认真扎实的研究。

第二期：从南明弘光、永历到清康熙、雍正，17 世纪 40 年代到 18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商品经济萌芽在以清代明的战火中备遭摧折而后又艰难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满族作为我国东北边疆处于部落酋长时代的游牧民族，联合了蒙古贵族和汉民族的败类，依仗其骁勇善战的铁骑和残酷屠杀的政策，

详见萧蓬父、许苏民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上编第 1 章第 1 节：“明代中叶中国近代商品经济萌芽的基本特征”。第 27—38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

详见萧蓬父、许苏民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上编第 1 章第 1 节：“明代中叶中国近代商品经济萌芽的基本特征”。第 29—38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

征服了经济文化虽然发达但却文弱的汉民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在其他许多城市实行的野蛮屠杀，使中国新兴的工商业都市被扫荡破坏殆尽。其统治稳固后，为恢复经济，才实行既“重农”、又“恤商”的政策，经过近百年的恢复，才使中国经济达到接近于晚明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即使是在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市民们的生活仍然很痛苦。唐甄描述康熙年间人民的生活时说：“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缙钱，无以通之。故农夫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腴。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蜎体不伸。吴中（苏州一带，——引者）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遍布海内。”^①康熙年间，号称“家给人足”。但要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马屁文人的话是不可信的。唐甄讲了真话，所以章太炎说“惟甄发其覆蒙”。^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受到的严重挫折，主要是由游牧民族的征服所造成的。但这一时期，在云南，仍然出现了商人大量投资采矿业、商业资本继续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情形。

第三期：从清乾隆到道光二十年，即 18 世纪 30 年代至 19 世纪 30 年代。

这一时期，确实又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获得较大发展的阶段。一方面，东南沿海手工业各部门和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继续生长，商业资本和手工业产业资本之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出现了手工业完全为商业资本所操纵的现象。例如，在戴震生活的

《潜书·存言篇》，此据章太炎《检论》引，与原文略有出入，参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潜书注》第 332 页。

② 《检论·袁清史》，转引自《潜书注》附录，第 574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9 月版。详见萧孝父、许苏民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中编第 1 章第 1 节“清初的经济和政治”，第 269—270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

乾隆时期，有一位叫程先甲的学者曾写过一篇《金陵赋》，其中描写商业资本与丝织业的关系说：“机声轧轧，比户喧阗，万家篝火，世业相传，商贾云集，于此懋迁。”程氏自注云：“金陵贡缎、宁绸之名甲于天下。开机者谓之帐户，亦曰缎号，代客买卖者曰缎行，机匠领织曰代料。”江浙一带工场手工业的规模更大了，商业更繁荣了，许多城市还出现了如同今日都市中到处可见的巨幅商品广告。另一方面，以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开放矿禁为契机，全国的经济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放开搞活的新气象。

开放矿禁的政令一下，全国上下顿时出现了“开矿热”，“云、贵、两湖、两粤，四川、陕西、江西，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①。与此同时，经营煤、铁等矿种的商矿亦有了可观的发展。终乾隆之世，全国的大型铁矿约有八九十座。

由于采取了鼓励“招商承办”的政策，国内的许多投资转移到矿业部门，与此相应的是阶级结构的新变动，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厂民”（矿场的投资者和主持人）阶层。大量的富商大贾将资金投放到采矿业中，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商人们成为“厂民”的主要部分；一些地主也投资矿业，成为矿主兼地主，有的干脆“自行变产作本”，弃农从矿，由地主而变成“厂民”；此外，有身为知县而要求弃职办矿者，有身为监生而具呈出资开矿者，有“八旗子弟”申请“恩准”他们开山采矿者，其中有一些终于成为厂民阶层的组成部分。“厂民”阶层是中国近代矿业资本家的前身，邓拓收集的《云南东川赵氏宗祠碑志》的拓片证明，有的近代矿业资本家就是从乾隆时代的“厂民”家族发展而来的。

与商办矿业的崛起相应，是雇佣劳动大军的出现。成千成万的农民“不安于陇亩”，纷纷奔向矿区，甚至远走矿业最发达、最

①《清史稿》卷124，《食货志》5，《矿政》。

能赚钱的云南，如今日川、湘、淮各省农民下广东一般。据乾隆三十一年云贵总督杨应琚奏：“滇省今年来矿厂日开，各处各小厂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数十万人，现在各省来滇者亦络绎不绝，其间江、楚等省流寓倍于滇省。”其他各省弃农从矿的人数当也不在少数。这一巨额的人口摆脱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从农到工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是社会酝酿着重大变革的前奏。投资开矿的“厂民”与矿工的关系，是“界以资而役其力”的雇佣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厂民”是采用支付工资的形式以购买“矿丁”们的劳动力的。^①“当时的大矿，据记载，往往有从业人员六七万人，稍下而次之，亦有一二万人或数千人。一矿之内，包括广大的‘矿丁’和诸如镶头、峒领、炉长、客长等管理和技术人员在内，已经是一个需要有相当严密的分工，有一定管理规章和技术操作章程的生产单位。其人员的众多，规模的宏大，已相当于近现代的大企业。特别是，已经普遍建立起雇佣关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②

商办矿业的迅猛发展，有力地启动了全国商业经济的发展。星罗棋布的矿场在全国各地的建立，往日的穷乡僻壤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了大量的人口，由此便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和矿场城镇化的趋向：“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覬覦沾溉。”^③矿区商业贸易的繁荣，又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了更大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业经营的发展。以贵州为例，由于矿业的增长，有力地带动了全省的商业和经济繁荣：“现今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

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下。

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第 227 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

王崧：《矿厂采炼篇》。

积，商贾日集。……川、粤、江、楚各省人士，趋黔若鹜。”^①

与此同时，在清政府内部也发生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关于矿产品自由贸易的争论，不仅提出了矿产品自由贸易的主张，甚至还提出了在一切经济领域中打消阻碍商品自由流通的壁垒、建立统一的国内自由贸易市场的要求。广西巡抚杨超、广东布政使托庸、甘肃巡抚吴达善、云贵总督鄂宁都曾先后上疏要求调整矿产品限价收购和专卖政策。还有一些人多次提出干脆取消“限价收购”政策或对之作大幅度修改的倡议，如云南布政使陈宏谋、两广总督鄂昌、广东巡抚周人骥等，并且在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等少数地区还一度试行过。由于许多一、二品大员连续不断地为商矿的经济利益呼吁，到乾隆末年，连军机大臣和珅也主张有必要放弃久已奉行的限价、专卖政策。更有甚者，有人还提出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国内自由贸易市场的要求。乾隆中叶，江南安庆按察使刘柏为在全国开放铁禁上奏，他列举事实，力斥既往为限制运销铁制品而制订的许多繁琐已极的手续，徒然阻碍商品流通：“计自贩卖以至卖完，须经数十官吏。夫商人而足入公庭，胥役必视为鱼肉，层层需索，处处稽查。商人之费用既多，铁片之价值自贵。”他认为，应当把全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考虑，打破人为的限制和关卡，解除束缚商业发展的各种桎梏，使全国各地之间能够互通有无：“直省内地，莫非王土，原无彼疆此界之分，自应任其兴贩，毋庸给照注定地方，以滋商民之累也”。这种观点，正是乾隆时期中国近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①《清高宗实录》卷三。

三、中国社会风尚的变化和学术思潮的 “新”与“变”的气息

与明代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出现了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的变化，并且反映到观念形态的领域。从主要的和积极的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唤起了民众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唤起了他们对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方式的追求，有力地冲击了专制主义的“天理”的统治；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出现了以“人的觉醒”为中心，批判程朱理学、宗法礼教和君主专制，宣传科学反对蒙昧的早期启蒙思潮。而社会风尚变化的消极面，则主要是由过时的专制官僚体制所造成，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享有政治特权的官员们的贪欲，造成了权钱交易和官场上的空前腐败。

从文献记载来看，普遍认为明朝正德、嘉靖前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无论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等级名分的限制。明朝正德以前，社会生活还严格地遵循着等级名分的规范，但嘉靖以后就不同了。顾起元《客座赘语》说嘉靖以后南京妇女的服装由朴素而华丽，市民的生活日益考究。《震泽县志》说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庶民之妻多用命服，住房衣着都不再受礼教的等级限制。《博平县志》说：“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纓帽细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汨汨侵淫……”反映市民阶层对于丰富多彩的感性生活之要求的通俗流行歌曲受到社会普遍欢迎：“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间尚《锁南枝》，……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语意则直出肺腑，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其情尤足感人也。”（李开先《市井艳词序》）以清代明的战乱和满清王朝的残酷屠杀、对市民文学

的禁止虽然使得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萧条了一段时期，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民们的风尚和生活情趣又恢复到晚明的气象，甚至还超过晚明。仅以反映新的情感方式的俗文学为例，其繁荣程度就大大超过了晚明，据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说：“明人大规模的编纂民歌成为专集的事还不曾有，都只不过是曲选或‘杂书’的附庸而已——除了冯梦龙的《挂枝儿》和《山歌》二书之外。但到了清代中叶，这风气却大开了。像明代成化刊的《驻云飞》、《赛赛驻云飞》的单行小册，在清代是计之不尽的。”^①郑振铎曾搜集清代中叶各地单刊歌曲 12000 余种，但照他的看法，这“还仅仅只是一斑”^②，可见当时俗文学流行的盛况，似乎竟如同今日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流行歌曲层出不穷且不断花样翻新一样。当年的流行歌曲，亦大多是街巷市井里的男女们的情辞，以极浅显的语言来表达最深挚的情意，其想象力之丰富和情语之大胆显豁大大超过了晚明的情歌。甚至如今港台歌星们唱的某些歌词，如“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之类，也是来自乾隆年间的流行歌曲。

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早期市民阶层的需要，亦刺激了戏曲的发展。晚明戏剧最著名的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其中影响最大的又是描写封建礼教禁锢下妇女的性压抑、以争取恋爱婚姻自由为主题的《牡丹亭》。清初康熙皇帝严禁所谓“淫词小说”，戏剧创作一度萧条，但仍有李渔的《无声戏》（被禁）、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长生殿》^③等著名戏剧问世。到了乾隆年间，都市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 407—408、408 页。上海书店 1984 年根据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复印。

同上

笔者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中误将洪升著《长生殿》写在乾隆时代，特在此处更正。洪升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 后），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长生殿》定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

的戏剧舞台又恢复到晚明的繁荣景象。晚明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等又俨然成为“新剧”和“新腔”而风行起来。戴如煌《闻演新剧戏作》云：“清歌四梦谱临川，笙歌霓裳对绮筵。妙绝风流年少客，居然天宝李龟年。”王藻《观剧四首》之一云：“《牡丹亭》曲谱当筵，风雨烟波句欲仙，要识临川汤若士，一生爱好是天然。”程瑞枋《都门元夕踏灯词》中亦有“新腔闻演《牡丹亭》”之句。同时，在乾隆年间，亦有不少著名学者继承汤显祖的“至情说”来从事戏曲创作。著名的“江左三大家”之一蒋士铨（1725—1785），著有《红雪楼九种曲》，其中最著名的是《临川梦》，以歌颂汤显祖与《牡丹亭》为主题，当时人评蒋士铨的剧作“真得《还魂》神髓”。如皋人黄振（黄瘦石）作《石榴记》，亦直追《牡丹亭》之遗意。此外如《彩霞幡》、《乌阑誓》、《芙蓉楼》、《洞庭缘》……，皆以歌颂爱情和婚恋自由为主题，连雍正年间问世的《红楼梦》也被改编成《红楼梦传奇》、《红楼梦散套》而搬上了戏剧舞台。

“礼教”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发挥其对妇女的禁锢作用，是明清之际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之一，这种现象在清中期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晚明。嘉庆元年（1795年）袁枚辑《随园女弟子诗选》选录其女弟子28人之诗。乾嘉间有钱塘女诗人夏伊兰（别号佩仙）曾作诗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说，其《偶成》云：“人生德与才，兼备方为善；独至评闺材，持论恒相反。有德才可赅，有才德反损，无非亦无仪，动援古训典。我意颇不然，此论殊偏浅。不见三百篇，妇作传匪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年间还出了一位著名的女科学家王贞仪（1769—1797，乾隆三十四年至嘉庆二年）。她是南京人，著有《星象图释》二卷、《书算筒存五卷》、《筹算易知》、《重订筹算正讹》、《西洋筹算增删》一卷、《文选（诗赋）参评》十卷、《德风亭初集》十四卷、《德风亭